生物醫學與生命倫理學：科學主義的問題

翁若愚

Jeffrey Bishop 的〈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西方醫學史的教訓〉一文(Bishop， 2015)論述了科學與宗教在美國醫學發展史內此消彼長的關係，大體上主要就是醫學的科學化及其流弊與改革，及宗教意識形態的失語以致最終的邊緣化。他認為三次的改革，均嘗試糾正美國醫學中崇尚科學主義的心態。科學主義在醫學上，主張診斷治療時應該使用科學方法審視病人的身體、心理以至病人處身的社會環境等因素。他認為醫療改革的幾次失敗，其原因正在於捨棄了最初神學及宗教人士鼓吹，針對醫學中崇尚科學主義的改革。

根據 Bishop，美國醫學的科學化源於十九世紀末，當時全美只有約五分之一的醫學院著重科學在醫學課程的應用角色。醫學教育委員會主張革新醫學課程，加強科學方法的應用，注重解剖學、生理學、細菌學、病理學，以及生物化學的學習。Bishop 認為這些革新影響深遠，科學方法成為了日後所有醫療實踐與研究的標準。他認為，醫學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對科學方法的依賴，對自然主義的堅持，及對世界整體高度機械化的理解。這些因素構成了科學至上的主義。科學化的醫學以科學簡約化的方法，處理身體和各種疾病，在治療的過程中把病人經驗到的心理、社會、

翁若愚，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一級導師，中國香港。

《中外醫學哲學》XIII:2 (2015 年) ：頁 119-122。
© Copyright 2015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精神狀況轉化為科學語言，然後再作科學的簡約化處理。例如精神病被簡化為生理學與化學的問題。

科學主義的簡約化問題，早為人所咎病。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科學化產生的危機越見明顯，神學及宗教界別發起了第一波的改革，帶來了生命倫理學。自此以後醫學與生命倫理學開始分工合作。前者交由醫生處理身體機能的失衡，後者交由世俗化的醫院院牧事工處理治療的道德層面。隨著後來連番的改革，分工更精細，除了醫學層面、道德層面，再分出心理、社會，與精神層面，一一交由不同的專業處理。

Bishop 稱呼第一波的改革為醫學的生命倫理改革。他認為第一波改革能夠取得進展是因為，雖然最初的生命倫理學家均為宗教人士，但是當他們批評醫學科學化的流弊時，卻刻意淡化了基督教的意識形態，以世俗化的語言表述富基督教色彩的道德規條。因此醫學界能夠接受他們的批評。

Bishop 認為神學家本來就是為公眾的形而上道德關注發聲的最佳人選。因為西方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均源自基督教的宗教觀念。可是事實上，改革初期醫療科學家視生命倫理學為威脅。社會上也對宗教聲音在公共空間的角色帶有戒心。畢竟美國是日益世俗化的社會。在另一方面宗教的本體論與目的論，跟世俗化的科學的本體論與目的論本來就互相競爭，科學的道德觀對美滿人生的看法，跟基督教倫理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別。一些生命倫理學家嘗試以普遍的道德理論消除當中的分歧。但總的結果還是以宗教及神學家的緘默失語告終。此外政府成立的各類諮詢委員會也在推波助瀾把宗教與神學的聲音從生命倫理學中消除。另一方面科學方法在醫學研究與應用上的成功，進一步迫使基督教的本體論與目的論靠邊站。結果原來源自宗教界的生命倫理學日趨世俗化，例如基督教的救贖觀念被延伸理解為不惜代價維持生命的醫療觀念。

Bishop 認為可惜的是，由於最初來自宗教界的改革者在其批評中隱去了宗教的本體論與目的論的用語，醫學的本體論與目的論自然取而代之，自此以後醫學的道德觀變成正統。來自宗教界的改革者首先放棄了對醫療目的的討論，任由世俗化的醫學自是其是，自行制定目標。

Bishop 認為第二波改革因為源自臨床醫學本身，所以它自然繼承了醫學的科學主義與世俗化，因此也是反宗教的。恩格爾是第二波改革的先驅，他認為所有醫學都不應該被簡化，他又認為西方醫學的核心問題，在於它二元分化看待心靈與肉體，因此不能完整的處理人的整體性。Bishop 同意恩格爾的主張及其對科學的簡化主義的批評。可是他也批評了恩格爾。他認為恩格爾錯誤地把心靈與肉體分割的二元論歸咎於基督教神學，是張冠李戴；他認為二元論源自笛卡兒的科學觀，並非基督教的觀念。現代的新教才接受心靈與肉體的二元分化，傳統基督教與天主教則相信人死後靈魂與肉體必須俱在方可得永生。

問題是事實上哲學的二元論可追溯到希臘時代，如柏拉圖的哲學，比笛卡兒早近二千年。要討論哲學的二元論對基督教及科學主義的影響，不能如此簡化下結論。另一方面不少聖經章節支持作二元論的閱讀，當然也有不少章節支持作唯物主義的閱讀。如果 Bishop 能多作論證，效果會更好，道理也更加清楚。他的觀點是否合理，可以交由讀者再研究判斷。

Bishop 認為醫學的第二波改革，重複了醫學的科學主義，儘管本來它的出發點正是改革科學主義。因為在應用上醫生往往以科學研究方法審視病人的身體、心理以至病人處身的社會環境等因素。科學主義無孔不入。醫療改革的第三波是生物心理社會精神改革。它本來嘗試撥亂反正，把精神性重新帶回醫療，加強對人的關懷。但是 Bishop 認為第三波的改革也註定失敗。因為它犯了同樣的錯誤，訴諸科學研究方法，制定許多不同的評估標準以量度病人的心理與精神狀況。

醫學的進步，主要是由於科學取得了主導地位。Bishop 正確地認出了兩個重要因素：醫學的科學化與世俗化。但是科學主義帶來了問題。醫學在科研及技術上越先進，越發顯得對人冰冷忽視。科學方法處理不了的環節，如病人的心理、精神、社會層面都被忽略。醫學是生活世界的產物，可以說美國醫學的科學化與世俗化不過是呼應了美國社會的科學化與世俗化，其必然性在此。醫學也是文化的產物。中國的醫學應該走自己的路，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自我完善。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正是一個顯例。

參考文獻

比徹姆和丘卓斯：《生命倫理的原則》，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Beauchamp, Tom, L. and Childress, James, F.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7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柏拉圖：《斐多 : 柏拉圖對話錄之一》楊絳譯，香港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Plato. *Phaed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恩格爾哈特，李學鈞、喻琳譯：《生命倫理學和世俗人文主義》，西安 :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英文原著：Engelhardt, H. Tristram. *Bioethics and Secular Humanism* (Philadelphia: SCM Press, 1991).〕

傑佛瑞．彼索普：〈從“生物醫學模式”到“生物社會心理精神醫學模式”——西方醫學史的教訓〉，載范瑞平編，《中外醫學哲學》，2015 年，第 13 卷，第 2 期，頁 89-118。Bishop, Jeffrey P. “From Biomedicine to Biopsychosociospiritual Medicine: A Lesson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edited by FAN Ruiping, 13:2(2015), pp.89-118.